



头门山海战英雄艇

□ 房 振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为数不多的舰艇中，有一艘功勋卓著的中型炮艇414艇——“头门山海战英雄艇”。这艘炮艇曾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也见证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南京笆斗山起义的光荣时刻，更是人民海军创建初期不畏牺牲保卫海疆的功勋。

抗战时期，日本海军针对我国南方水网密集的特点，研发了一款中小型内河炮艇，称为内火艇（炮艇型），该艇总计建造77艘，其中的大部分部署在我国南方地区。因为其排水量25吨多，国内称为日制25吨型炮艇。该型艇吃水较浅、机动灵活，适合江河湖泊行驶，也能在近海风浪较小的区域行驶。采用平甲板型，驾驶室为装甲半埋式结构，艇上部配有机枪和迫击炮，艇体的后半段为载员舱，可搭载约两个班的陆战队人员，主要用于水网密布地区小规模快速登陆或对地火力支援作战。

该艇长18米、宽3.5米，动力为300马力双柴油机，最高航速11节，最大吃水深度1.2米。艇首配备迫击炮一门，驾驶舱顶部靠后位置装备九三式13毫米单/双联机枪一挺，乘员舱上方配备三式重机枪一挺。

日本战败投降后，其在中国境内残存的25吨型炮艇被国民党海军接收。1948年9月，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向解放军方面建立秘密联系，下定了起义的决心。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华东海军成立的当天，林遵率领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30艘舰艇、海军官兵1271人，在南京笆斗山长江江面光荣起义，被毛泽东、朱德称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头门山海战英雄艇”便是参加这次起义的一艘炮艇。

新中国成立后，该型炮艇成为人民海军第一批炮艇部队的主力，



被赋予近海保卫任务，并参加了一些海上作战。该艇原隶属于华东海军温台巡防大队，曾在披山、檀头山、东矾列岛等浙东沿海剿匪作战中屡建功勋。

1950年7月11日，华东军区以414艇在内的该型炮艇4艘、登陆艇2艘及装载陆军2个步兵营的机帆船30余艘组成登陆输送队突袭披山岛。12日拂晓到达披山岛海域后，炮艇即向停泊在该岛锚地内的国民党军舰船发起突然袭击，多艘国民党军舰船仓皇逃出锚地。护航艇队以3艘炮艇进行追击，并集中火力攻击其“精忠1号”炮艇，迫使该艇投降。另1艘炮艇将国民党军“新宝顺”号炮艇堵在锚地内，向其猛烈射击，后开足马力猛撞其尾部，致使该艇后舱进水。随后，2艘增援炮艇接舷近战，跳上该船使用炸药包和手榴弹将其炸沉。披山海战，以小艇撞大舰、跳帮作战等海上拼刺刀战法，表现出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精神，为以后的海陆协同作战积累了不少经验。

此时，这些为数不多的炮艇经过十多年服役，许多艇况已不是很

好，这次又暴露出在海战中原有武器装备火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海军对武器装备进行了适当升级改造，部分在驾驶舱顶部换装了一门九六式25毫米机炮或者72K型25毫米机炮。

1951年6月23日，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3艘运粮船由坝坝港驶往海门，另有900多艘渔船由石浦返回台州，请求人民解放军海军进行护航。当时，浙江沿海这一带经常遭遇海匪和国民党海军的袭击与骚扰。为防止敌舰截击商船，保护海上交通和渔民生产，华东军区海军舟山基地决定派出温台巡防大队的炮艇分队在海匪可能袭扰的南、北泽岛海面地区设伏。

6月24日凌晨，4艘炮艇（411、413、414、416）由石浦港起航，天亮时达到设伏海域，但海上雨雾弥漫，只能靠听觉辨别。忽然，战士们听到西南头门山方向海上有枪声，立即高速出航。指导员陈立富率414艇一马当先，途中因为发现可疑敌情，416艇离队前往检查，411、413两艇又出现机器故障掉队，只剩下414艇继续朝枪声密

集的方向驶去。414艇到达白沙山岛以东海面，看到海匪配有火炮和机枪的4艘大型机帆船，其中1艘三桅大机帆船拦头截住了3艘运粮船的去路。其余3艘正把运粮船压向岛岸，准备抢劫。414艇毫不犹豫地选择战斗，首先击伤其中一艘大型机帆船，救出了被围困的运粮船。敌船见势不妙掉头向头门山岛方向逃窜，414艇不顾敌船火力威胁紧追不放。当海匪驶到头门山附近海域时，以为可以获得岛上国民党军的火力支援，便掉过头来反击。

414艇毫不示弱，冲到距离海匪船100米左右的地方，独自向一艘三桅大机帆船猛烈射击。战斗中414艇机舱发生故障，敌船乘机反击，1发炮弹击中414艇艇尾油箱，后甲板燃起大火，艇上5人负伤，枪炮兵王维福多次负伤仍坚持战斗。随后416艇很快跟上，411、413两艇排除故障也赶到，4艇会合同打击敌船，于一江山岛以南将1艘双桅机帆船击沉，其余敌船见势不妙慌忙向一江山岛、大陈岛方向逃去。此次我海军炮艇部队果断追击，击沉敌大机帆船1艘，击伤3艘，击毙海匪30多人，掩护了3艘运粮船安全通过

和900多艘渔船生产。在这次头门山海战中，414艇深入敌群，孤艇作战，战绩突出，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传为佳话，被华东军区海军命名为“头门山海战英雄艇”，指导员陈立富和枪炮兵王维福获得“战斗英雄”称号。1952年后，国产52甲型炮艇量产服役，该型炮艇陆续退役，414艇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供稿）



七支队起义：打响潍北大地抗日第一枪

□ 刘 杰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沿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在山东地方党组织的带领下，潍北大地的抗日青年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于1938年1月27日拂晓打响潍北地区抗日第一枪。

重建县委，筹划起义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建立统一战线，挽救民族危亡。7月中旬，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由延安返回济南，贯彻党中央指示：“立即领导武装起义，迅速组织全民抗战”。10月，日军侵占济南，国民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奉行“不抵抗主义”，一枪不发，率部弃城逃走。山河沦陷的紧急关头，省委紧急召开“博山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鲁东工作委员会”，深入鲁东，发动群众武装起义。会后，工委书记鹿省三迅速赶往潍县、昌邑（两地今属山东潍坊），联系党员，组织群众，组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以下简称七支队），担当起发动武装起义、抗击日寇的历史重任。

1937年10月中旬，在城北贾庄村的小树林里，潍县“民族解放先锋队”集会成立，会议选举王一之为“民先”队长，号召队员奔赴战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1月，根据省委指示，鹿省三在潍北华幢村召开党员会议，恢复重建潍县县委，耿锡章担任县委书记，牟星桥任组织委员，薛绍庚任宣传委员，牟龙高任交通委员。县委重建，加快了举行武装起义的进程。12月，

济南沦陷后，日本侵略军沿胶济铁路一路东犯，激发了潍县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民族义愤。潍县高里镇“民先”负责人郭焕申带领队员截获国民党寿光县政府步枪30余支，手榴弹200多枚，子弹300多发，为武装起义打下了一定武器基础。

民众抗日思想激情高涨，大革命时期隐蔽下来的共产党员纷纷联络民众，准备走上抗日战场。鹿省三等共产党人重新组建起潍县县委，酝酿筹划武装起义。1938年1月9日，日军侵占潍县县城，国民党第八专区专员厉文礼先期率部逃走，抗日局势急转直下。24日，鹿省三在华幢村小学召集紧急会议，决定于27日在潍北蔡家栏子村举行武装起义。

“本军到此是为了抗日！”

1938年1月27日拂晓，来自潍北大地的300多名抗日青年，在鲁东工委和潍县县委的组织下，集合在潍北蔡家栏子村，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部队分为三个中队，鹿省三任政委，王培汉任支队长，王一一任政治部主任，以支队长王培汉的名义庄严贴出布告：“本军到此是为了抗日！”全体七支队战士走上抗日游击战场，在冯马杨孟村、南阳村等处袭击日本侵略军，打响了潍北抗日战场上的第一枪！

七支队起义的枪声震荡潍北，点燃起民众抗日的不息怒火。起义部队东进后，根据鲁东工委部署，七支队留在潍北当地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中组建党组织，扩大武装力

量，担当重任，英勇斗争，在艰难困苦の日伪统治下，沉重地打击了日、伪、顽反动武装。

1938年3月2日，共产党员何凤池、宋照来、赵大志、何凤鸣等，在起义成功的鼓舞下，带领东、西曹庄一带的青年农民宣布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二大队，并在4月组织数百名群众，对坊子至蛤蟆屯之间的20余里铁路进行了大破坏，袭击了蛤蟆屯车站，杀伤日军8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4月下旬，留在潍北的40余名七支队战士，在潍县县委书记耿锡章的带领下，成立“七支队后方工作委员会”，同日、伪、顽英勇战斗，挑起重担，抚恤战斗中牺牲的七支队家属、动员青年参加七支队补充兵源、收集枪支增强七支队战斗力的艰苦重担。

发展壮大，屡立战功

1938年2月2日，七支队主力转移至昌邑瓦城，与当地起义武装力量会合。中旬，在安丘成立的“第三十四别动大队”200余人赶往瓦城编入七支队，使七支队扩大至700余人。3月25日，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共产党员马保三带领的八支队由寿光傅家庄来到瓦城，两支队由寿光傅家庄来到瓦城，两支队合编，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指挥部，4月下旬，七支队二大队1300余人长途跋涉，冲破日伪层层封锁，到达黄县，与七、八支队会师。5月，占领龙口、攻克黄县，部队快速发展到有6000多人、5000多支枪，成为一支军威严整的抗日劲旅。

1938年6月，七、八支队合编

为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7月，奉命由胶东西进，8月下旬，部队到达清河区，配合部队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12月中旬，部队进入沂蒙山区，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1940年9月，第一、四支队合编为山东纵队第一旅，先后参加了五井、青驼寺、大柏山等战斗。抗战后期一部分被编为山东军区4师11团，1947年1月，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八纵队，1949年2月，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26军77师229团，先后参加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85年12月，改编为陆军第26集团军，2017年4月，重新组建为陆军第80集团军，军部驻潍坊。另一部分抗战后期被编为山东军区3师7团，抗战胜利后进军东北，后编为东北野战军第40军118师352团，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战功卓著。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第二、四、五次战役，屡立战功。

七支队起义已走过了80多年的历史，但永远昭示着历史前进的征程。这次起义揭开了潍北人民抗击日寇的序幕，谱写了潍北抗日战场上的一曲壮歌，展现了党领导的七支队战士挺身而出、勇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技术产品和武器装备要想从工厂快速走入战场，转化为真正的战斗力，“应用”环节不可或缺。所谓技术应用，简单说就是在洞察掌握技术内在原理的基础上，挖掘利用技术特性规律，发挥技术潜质优势，创造性支撑开展装备作战、对抗演习和部队训练等军事活动的能

力。一般来说，技术应用力越强，装备的技战术性能越能得到发挥，相应的战术战法也就越灵活高效。反之，若技术应用不及时、不准确或不到位，就有可能在战争中落于“下风”，甚至为失败埋下“伏笔”。以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为例，从唐宋开始就应用于军事领域，先后繁衍出火枪、火箭、火炮等系列热兵器，一度遥遥领先的火药应用能力却在有清一代被强行按下“暂停键”，长期锁在密库里蒙尘，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百年的落后挨打。

增强技术应用力，前提是把握应用原则。对技术原理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是增强技术应用力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熟练掌握技术背后所蕴含的原理，才能找准适合的应用场景和方向，规避未知的应用风险，进而提出符合技术运行机理的军事创新理论。实际上，无论是“分布式杀伤”“马赛克战”，还是“混合战争”等理论，都蕴藏着丰富的技术基因，也都建立在技术原理的精准认知基础之上。增强技术应用力，还要遵循“技术决定战术”这一基本规律。正如当内燃机被分别装配到船只和飞机上时，就创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海战和空战一样，广大指战员通过技术装备的熟练驾驭、技术手段的针对性和适用性改造，以及技术与战术的耦合点位探索，颠覆性技术给未来战争规则带来的影响分析等，就可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能力优势、作战优势，打造出更为灵活多变的战术战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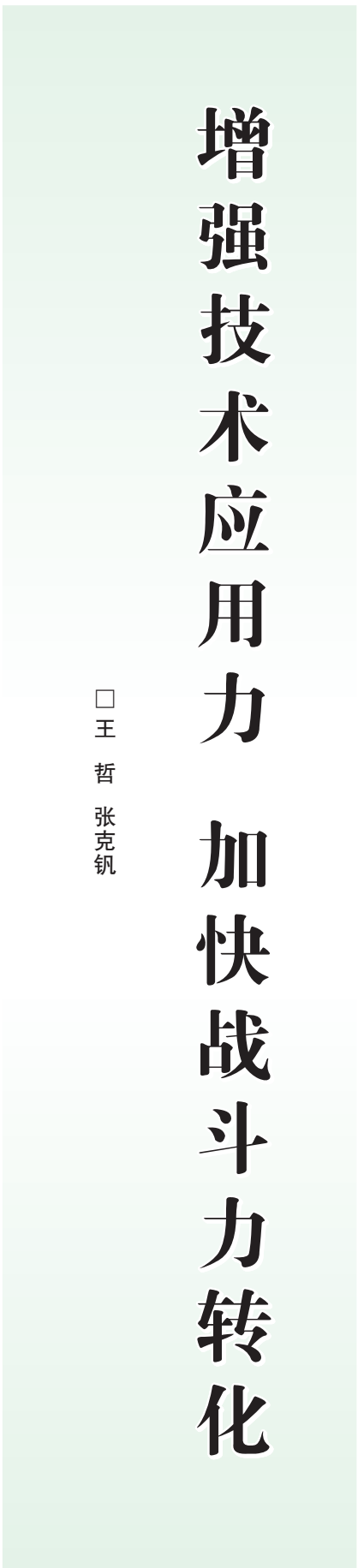
除此以外，还要牵住需求这一“牛鼻子”。这是因为战争形态的演进发展，要求我们不仅要跳出传统“有什么技术打什么仗”的逻辑定势，更要确立起“打什么仗用什么技术”的新思维理念，把未来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以什么方式打仗搞清楚，从战场需求中寻找技术应用的时机、场合和具体方式。瞄准需求用技术，还要把能否支撑制衡强敌作为检验技术堪用实用好用的唯一标准，着眼潜在作战场景遴选可用技术手段，瞄准未来作战样式优化技术运用方式，盯住强敌“七寸”部位提出技术应对方案，确保技术使对地方、用出效益、形成战斗力。只有将“技术决定战术”与“战术牵引技术”辩证统一起来，才能推动战斗力生成模式的全面变革。

增强技术应用力，贵在产生出奇制胜的应用效果。技术应用之要，贵在出奇，不可测识。对于一项技术来说，利用变换用法、调整用途、拓展边界等非常规和创意性操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挖掘技术装备的潜能，打造出奇制胜的应用效果。以无人机技术为例，有的国家跳出传统无人机一般由金属制造，极易被雷达探测到的窠臼，改用由涂蜡硬厚纸板和用来固定机翼的橡皮筋组成的利尔沃无人机，轻松越过敌防空网，成功摧毁敌军机场多架战机，就是技术应用向内挖潜、剑走偏锋的典型案

例。由此可见，即便是老技术，一旦用得奇、用得巧，同样能够焕发出全新战斗力。除了挖掘老技术的应用潜力外，将颠覆性技术与传统技术巧妙结合起来，综合权衡应用难度、成本和作战效果等因素，也可以形成实用管用的技术方案。例如，“星链”系统作为一项新技术，在强大的卫星通信能力基础之上，通过与鹰眼360等商业公司合作，引入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图像，进一步具备了光学侦察能力，为拨开战场情报迷雾、抢占优势主动提供了更多支撑。

此外，还可以向民用技术延伸拓展，发挥部分商业技术成熟度高、携行方便、成本低廉、与军事行动耦合度高的优势，合理迁移应用为战法创新、战斗力变革提供可能。比如，有的国家将大批量消费级无人机进行军事化“魔改”，挂装手雷和小型炸弹、组成自杀式无人集群，对敌人腹地的重要目标实施远距离精确威慑和袭扰，直观颠覆传统作战样式，引发战法创新高潮。颇具变革意味的是，“民技军用”样式的延伸拓展，使得造价千余美元的民用产品，无论打击什么样的目标都很“划算”，相较动辄几十万美金的导弹效费比更高。

增强技术应用力离不开灵活机动的应用策略。说一千道一万，人始终是技术应用的主体。充分考虑不同类型的



□ 王 哲 张克帆

力生成的瓶颈矛盾，研究提出体系化的技术应对方案。点、线、面逐级递进应用，形成全维立体的技术应用体系。技术应用不宜僵化死板，根据不同属性的军事问题匹配最合适的技术手段。例如，针对联合训练实战环境构造难、涉及军兵种要素多、组织实施成本高的问题，优先选用数字建模仿真、虚拟对抗博弈等技术。围绕战场感知手段缺乏、数据处理效率不高的问题，重点运用信息技术予以解决。聚焦军事决策水平不高、自主行动能力不够的问题，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创新。

技术的充分应用，还需要战场前后方的协调联动。一线官兵根据使用经验对技术进行敏捷改造，开展技术小发明和微创客，配合后方指挥机关从宏观顶层对技术应用的规划指导，前后联动起来能够最大程度激发应用活力。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自上而下鼓励引导官兵开展技术应用，自主研发制拉火管、抛射炸药等器材，发明连炸、悬炸、飞炸等方法，有力弥补了爆破装备的能力不足。同样，前后方因缺乏联动，制约战斗力发挥的例子也不少。二战期间，美军高层固执地认为主力M4坦克仅是步兵的支援力量，没必要更换升级，但实战过程中士兵却发现坦克装甲薄、射速慢，性能上严重落后于德军，想方设法加装沙袋、钢筋混凝土结构，甚至移植焊接敌方装甲残片仍于事无补。军队前后方的错位认知，导致盟军登陆诺曼底后不到一年就损失坦克近4000辆，教训极为深刻。

通过增强技术应用力来加快战斗力转化，既是对技术的全面依靠，也是对技术的有限依赖。也就是说，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首选技术支撑，通过技术的主动利用、创意使用和巧妙运用，不断提升技术对战斗力的贡献度。与此同时，对于一时半会还难以用技术手段解决的问题，还需统筹引入军事经验和专家知识，综合发挥战争艺术与军事科学的融合优势，技艺协调推动科技向战斗力加速转化。

